

反對派議員應嘗試做立法會「副駕駛」

【有一說一】
徐若曦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料將全數或絕大多數接受續任，社會普遍關注未來一年的議事堂能否回歸理性、反對派議員將會怎樣表演。近期有政界人士撰文呼籲反對派議員做「忠誠反對派」，也有學者分析反對派對向「忠誠反對派」過渡仍然十分抗拒。筆者認同反對派議員須轉向理性議會政治軌道，但感覺將西方議會「忠誠反對派」概念套用於香港立法會不太合適，或許新加坡工人黨的「副駕駛」經驗，對探討香港反對派在立法會的走向更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重回正軌發揮建設性作用

工人黨是新加坡多個反對黨中，影響力較強且唯一擁有議會席位的反對黨，在上月舉行的新加坡大選中，該黨取得史無前例的成績，在國會93個議席中取得10席，而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贏得83席。早在2011年，工人黨領袖劉程強提出一個經典比喻，形容工人黨是「副駕駛」，只負責監督人民行動黨執政，而不負責掌控方向。平實話語，道出反對派在議會中的角色。

首先，反對派的存在是「一國兩制」的體現，香港反對派議員擔任「副駕駛」的前提條件早已具備。劉程強說，單是希望司機一路平安把大家送到目的地是不足夠的，特別在道路顛簸不平的時候，我們新加坡恰恰需要一位副駕駛在前座。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曾講過，由香港人推出來管理香港的人應該有左翼、右翼及中間派，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香港特區成立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以最大的政治包容對待反對

派，反對派得以長期存在，有比較充分的政治空間，允許發表不同政見。在承擔特區重要憲制職責的立法會，反對派擁有為數不少的議席，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反對派要在議會發揮建設性作用，香港反對派議員有擔任「副駕駛」的能力。劉程強說，副駕駛在司機打瞌睡或魯莽駕駛時用力拍醒他，讓他及時回到正軌；如果司機友善可親，副駕駛可以選擇不斷地跟他說話，讓他這一路保持清醒。其實，香港的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內就經濟、民生政策等向政府提出過不少良方，比如有議員揭發公屋食水管道含鉛超標；有議員提議制訂支持少數族裔長者的醫療政策等，都有建設性。只要反對派議員有心有力為香港好，不論是剛性地「大力拍醒司機」，還是柔性地「不斷跟司機說話」，政府都虛心接受，這一點社會有目共睹。不過，近幾年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被少數「反中亂港」分子騎劫，已經偏離了監察政府施政的正軌，令人痛心。

第三，反對派在議會要守規矩有底線，香港反對派議員擔任「副駕駛」既屬必要也是情勢所逼。劉程強說，副駕駛坐在前排不會跟旁邊的司機搶方向盤，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在同一部車裏，如果車子發生意外，大家都會同歸於盡。回看香港亂象，從宣誓鬧劇到「修例風波」，從「拉布」癱瘓立法會運作到乞求外國勢力制裁香港，從非法「初選」到圖謀「35+」議席，一些反對派議員違背政治倫理，為一己政治私利在立法會內外興風作浪，不斷挑戰中央權威和憲法、基本法權威，觸碰國家安全底線，意欲奪取特區管治權，就是想拉全港市民同歸於盡！

慶幸的是，中央強力出手，香港國安法利劍

高懸，反對派過去內有政治獻金和街頭「抗爭」支持、外有美西方勢力撐腰的強勢已一去不返，現在外國主子保護傘失靈、金主如黎智英之流也必將受到法律嚴懲，反對派再想在立法會搞事面臨重重困難，如果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還會被罰出場甚至坐牢。估計反對派議員不敢、也不再可能搶到司機的方向盤，擔任「副駕駛」是個現實的選擇，即使心有不甘，也無可奈何。

理性務實才是最好出路

識時務者為俊傑，從政者更須懂得審時度勢，進退有據。新加坡工人黨「副駕駛」角色是成熟經驗，值得香港反對派議員效仿。最近，中央也向反對派議員提出了忠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遊戲規則，也有底線，大家都要遵守規則，都不能突破底線。」

反對派議員特別是至今還執迷不悟、想給中央「製造最大麻煩」的極少數人，都應當「停一停，想一想」。只有尊重憲法和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不逾越政治紅線，才有繼續合法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只有走出對抗思維的慣性，理性務實與中央和特區政府良性互動，才是最好的出路。

第六屆立法會延任期，既是過渡期，又是機遇期。希望反對派議員未來一年找準「副駕駛」定位，明底線、遵規矩、知分寸，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為監察政府有效施政、促進經濟復甦民生改善多做實事，向社會展現稱職為民的新形象。

資深評論員

香港未來的兩條道路

8月11日，全國人大全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現屆立法會任期延續不少於一年，為紛紛擾擾的立法會「真空期」爭議畫上了句點。從去年「修例風波」開始，香港一直被一個又一個政治議題綁架。反對派不斷消費和分化社會，使整個社會進入一個只分「顏色」，不問是非，民粹主義橫行的惡性循環中。疫情之下立法會延期一年選舉，不僅僅是對市民的健康負責，更是推動香港未來整體發展的重要舉措。

這次決定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後又一次重要的治港理論實踐，也代表着香港過去一年的政治動盪基本結束。就此無論是反對派抑或同情反對派的市民都應該認清兩個事實：

一是中央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的不僅僅是主權，還有治權。無論反對派們心裏服不服氣也好，這都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在「一國兩制」下，過去反對派不斷利用中央政府的忍讓與大度，變本加厲破壞「一國」之本，在外部勢力的鼓動下，走向危險邊緣，脫離政治現實的追求政黨與個人利益，不切實際的揆洋自重行為，最終傷害了自家和氣，還差點輸掉了香港。

二是香港是國家的核心利益。在過去一年

【議事論事】
李曉迎

的動盪中，一些人以為有美英在後面撐腰，有部分國際輿論支持，再配合本地一些議題的炒作，便可挑動「顏色革命」，奪權圖謀便可大功告成。殊不知這些只是過眼雲煙，西方政客的背后只不過是街頭巷尾的促銷吆喝，聲音再高、聲稱的再好也改變不了其低價貨本質，這些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更何況香港對於中央政府而言，毫無疑問是自家的親生骨肉，外人想碰一根頭髮絕對不行，如果還想把這個孩子偷走，那更要以死相搏。

為未來必須選擇建設之路

今天，我們因為互聯網的發展，而毫無防備地踏入「後真相」時代，事實是沒有什麼人願意去追究明白，更沒有多少人願意從多角度或超越個人立場去看問題。反對派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不斷的散布不實言論，來挑撥市民的情緒，讓香港政治陷入了只關注眼前，卻忽略長遠；只宣洩不滿，卻不計後果；只顧奪權，卻不理建設的民粹沼澤之中。

就政治選舉而言，一年的時間很短，但這一年時間卻給反對派帶來反思的機會，在這一年時間裏，是繼續夢想着奪權、癱瘓香港？還是回歸從政初心服務香港？留給每位參選人思考。對於香港市民來說，過去的一年大家在思想、精神上都過得很辛苦，未來的這一年，我們是否可以停一停、想一想，是繼續關注在政治爭議上，還是關注民生與發展上？對於香港的未來，我們也應該思考，既然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那麼香港的未來是什麼？香港人應該是什麼樣的？當一個又一個生命從學習走路，到自立面對世界，他們到底是需要什麼知識、技能、技術？作為特區政府、教育工作者、家長是否都做好準備？

「香港未來」是一個永遠不可迴避的議題，政治上如果香港選擇不要「一國兩制」的「一國」，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生活上還有什麼？精神品格上，如果我們不理性現實地認清自己，保持迎难而上的獅子山精神，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繼續立足於這片土地之上？對於香港，無論長期還是短期，擺在眼前的無非兩條道路：建設與毀滅。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毀掉羅馬只是一念之間。香港走哪一條道路，不僅僅是為當下的你來做出選擇，更是為未來幾代香港人做選擇。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

反對派的「總辭」鬧劇

【有話要說】
文兆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特首林鄭月娥在上月底引用「緊急法」，將原定下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並向國務院呈交報告，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選舉押後而造成的立法機關空缺問題作決定。人大常委會在8月8日全票通過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運作不少於一年，直到第七屆立法會任期正式開始為止。

為此，反對派22名立法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批評「決定」是白紙黑字地跟基本法第69條「每屆任期四年」的規定相違背，是褫奪選民的恆常選舉權，議會也不復有民意授權云云。可是，反對派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曾經鼓吹的所謂「集體總辭」，聲明卻沒有提及，只宣稱「他們會從不同渠道了解民意，詳細研究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很明顯，從反對派此一說法，顯示他們現在已無意「總辭」，所以要假借所謂「民意」，好讓為自己在未來一年留任鋪路。然而，反對派不是宣稱現屆立法會延任一年，違反基本法第69條的規定乎？不是說此舉剝奪選民的恆常選舉權？不是說延任後的立法會不再有民意授權嗎？既然如此，他們為何還要準備留任呢？

是故，先不論反對派對於決定的批評究竟是否有理，他們一邊批評現屆立法會延任一年，另一邊又打算繼續留任，根本是言行不一。我們亦能從側面看到，反對派當初提出「總辭」，不過是因為立法會選舉未押後前，四名現屆議員被選舉主任取消了參選資格（DQ），因而擔心當四人將不准延任，才會提出「總辭」妄圖藉此保住四人議席。

如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出爐，證明了反對派的所謂憂慮，不過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對派議員自然在「總辭」問題上含糊其辭。畢竟，議員每月人工超過十萬元，還未計實報實銷津貼，無故缺席會議又不會減人工，反對派真是「總辭」的話，又能去哪裏找這麼好的「筍工」呢？

說到這裏大家或者會問：反對派當中的「本土派」為何又繼續主張「總辭」呢？原因其實十分簡單：他們在立法會內並無議席，部分人在選舉未押後前已被DQ。在此情況下，主張「總辭」根本沒有成本，又能贏得媒體關注，這樣無本生利的事，又何樂而不為呢？

既然如此，那些主張立法會總辭的人，為何不索性主張「全面總辭」呢？理由選用說嗎？因為他們是區議員嘛！由此可見，不論是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主流反對派鼓吹「總辭」，還是現在主張反對派含糊其辭，只剩「本土派」繼續鼓吹「總辭」，背後都不過是一堆政治利益的盤算。什麼違反基本法，什麼「恆常選舉權」，什麼民意授權，只是為了攻擊政府而編撰的台詞而已。

時事評論員

全民檢測 守護香港

【焦點關注】
馮宣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沒完沒了，每日新增確診人數一度連續十二日破百，現在仍是雙位數，累計個案已超過4300宗。在國家全力支持香港抗疫下，特區政府早前宣布即將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冀通過大規模的篩查盡快找出隱形患者，將確診感染的患者立即送院治療，盡快安排密切接觸者隔離觀察，以徹底切斷病毒傳播鏈，務求將本土個案遏止到接近零，特區政府才有條件逐步解除各項社交距離限制，恢復社會正常運作。

在未有疫苗下，防治疫症只能靠早識別及隔離，以封截病毒的傳播，尤其於今次第三波疫情，源頭不明的病例多達四成，若不進行全民檢測，根本無法排除社區內的傳播風險。雖然各方盡力擴大檢測能力，但每日檢測量仍然有限；再加上本港醫療系統早已瀕臨崩潰，數以百計確診者須在家等待二至三日，才可以獲安排送院治療，這無疑增加其家人甚至區內居民的感染風險。可見單憑香港一地之力，實在難以打好這場抗疫戰。

本港行出全民檢測第一步，毫無疑問得益國家衛健委派出60人的檢測支援隊無私相助，有望將本港的檢查能力大幅提升至每日50多萬個。內地支援隊成員均富有抗疫實戰經驗，火速在西環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內搭建16個氣膜實驗室，亦即「港版火眼實驗室」。另為配合全民檢測，增加社區治療設施，中央已應特區政府要求，派出「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來港，以協助在亞洲博覽館再額外建設多一千個負壓床位，成為「港版方艙醫院」。另為應對冬季可能出現的新輪爆發，亞博館旁邊的一幅約32000平方米的用地，亦會建設「港版火神山」的臨時醫院，預計需時數個月。

中央出人出力出錢助港抗疫，既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關愛，也充分發揮了「一國兩制」的優勢。然而，反對派卻將政治凌駕一切，繼續「逢中必反」，找出種種無理方法藉口來阻撓，甚至危言聳聽恐嚇市民。特首林鄭月娥已保證，全民檢測最重要保障個人私隱，實驗室不會知道提供樣本瓶人士的姓名和身份，只會有號碼、條碼識別，有關樣本亦不會送往其他地方。反對派在抗疫最關鍵時刻仍到處抹黑，干擾防疫工作，罔顧大眾安全，也不顧香港經濟及民生受到威脅，確是其心可誅。

毫無疑問，愈多人參與全民檢測，必然愈能查找隱形患者，有助切斷隱形傳播鏈，也降低社區的感染風險，相反，若市民誤信反對派的謊言而堅拒參與，香港防疫工作難以取得成功。特區政府必須做好全民檢測的解說工作。

落實國安法 鞏固港優勢

【議論風生】
廖添誠

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被黑暴摧殘到遍體鱗傷的香港亦逐漸恢復過來，反對派抹黑國安法削弱本港的人權自由、法治及國際金融地位，根本是無中生有。

自去年6月起，在外部勢力煽動下，暴亂不斷升級，香港飽受創傷，情況變得不能接受。警方揭破多宗涉及私藏彈藥和槍械的案件，顯示本土恐怖主義風險上升，嚴重影響公共安全；亦有鼓吹「港獨」、「自決」的組織煽動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公然污損國旗國徽和衝擊政府部門。這些行為是公然挑釁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

市民的自由並沒有減少

另一方面，反對派多次揚言要癱瘓特區政府，更有人士乞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甚至制裁香港。這些行為已嚴重觸碰「一國」底線，危害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以及挑戰憲法和基本法。回歸23年以來，香港一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令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便堵塞了法律漏洞，從制度上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保障，讓香港社會回復安全和穩定，令市民可以繼續安居樂業。過去五年，本港共舉行約50000次公眾集會和遊行，即平均每日有20多宗不同規模的公眾活動。特區政府一直堅決維護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政府一再表示，市民依法享有和平集會、遊行

和示威的自由，這無論在國安法實施前後都是毋庸置疑的。

至於香港國安法影響投資信心、導致資金外流之說，毫無疑問是罔顧現實的誤導言論。客觀數據顯示，自今年4月以來，港匯持續靠近7.75兌一美元的強方區間，並多次觸及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至今已多次入市承接美元沽盤，合共釋出超過1000億的港元資金。本港的利息亦持續偏低。本港股市走勢轉強，且曾有單日成交超過2000億的紀錄。香港不但沒有出現顯著的資金外流，更是持續的有資金流入。

早前，國際指數公司MSCI更將其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期貨及期權產品的發行授權，從新加坡轉到香港，這是國際金融界對本港金融市場信心的其中一個證明。由此可見，香港的制度優勢未受影響，基礎實力依然強勁。香港在產權保障、司法有效性和政府誠信三項與法治有關的因素，評分皆有改善。

無可否認，自去年6月起不斷升級的暴力，已損害了香港的競爭力及國際聲譽。由今年年初開始，我們已在不同方面的國際排名有所下降，其中美國的傳統基金會發布的最新經濟自由指數，香港獲評為全球第二。香港過去四分之世紀都在指數中居首，失去首位原因主要是由於治安問題，拖低香港在投資自由方面的分數。

雖然最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的排名由第三跌至第六；但我們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優勢仍然明顯，包括我們的貨幣自由兌換、

世界級的銀行系統和股票市場，以及眾多支撐金融業的專才。香港去年首次公開集資（IPOs）總額達到400億美元，再次位列全球首位。儘管今年環境非常嚴峻，我們仍然樂觀，因為香港交易所迎接在美國上市的內地企業作第二上市將陸續有來。

競爭力仍名列國際前茅

最近，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排名第五，但仍位列於瑞典、加拿大、美國、德國和英國之前。雖然我們的排名低於去年的第二位，但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的排名分別維持第一位和第二位。再者，香港法規架構指標排名由全球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而匯率穩定性指標的排名更由全球第19位上升至第一位。這些處於全球前列的排名再次肯定香港的制度優勢，特別在法律和貨幣事宜方面。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大部分「抗爭」活動已銷聲匿跡，不少「港獨」分子紛紛逃往海外，「港獨」組織亦已紛紛解散，社會逐漸恢復穩定，達到了國安立法原先預期的效果和目的。國安法只針對少數人，絕大多數的人，包括奉公守法的跨國企業，應該歡迎香港可以回復穩定和秩序。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是香港由亂入治的分水嶺，有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讓香港能有機會重新再出發。

博士